

中国农村婚嫁模式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

严梅福 石人炳

【提要】 经验显示中国农村不同的婚嫁模式有刺激或抑制生育率增长的作用。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并揭示了招赘婚嫁模式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嫁娶婚嫁模式促成生育率增长的全过程及其内在机理。文章因此认为通过变革婚嫁模式来继续降低农村较高的出生率应是中国世纪之交人口控制策略的优选方案,提出了在短期内大范围地实现婚嫁模式变革的可行措施。

【作者】 严梅福 湖北大学教管系人口学专业,副教授;石人炳 湖北大学教管系人口学专业,讲师。

1. 研究目的

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就并存着两种婚嫁模式:一种是常见的“男娶女嫁”,我们称之为“嫁娶式”婚嫁模式;另一种是“男到女家”,即所谓“招赘式”婚嫁模式^①。对这两种婚嫁模式,人们除了知道它们有建构家庭的作用之外,对其是否还有其它作用,则很少注意。近年来,不同婚嫁模式地区的人口控制实践却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不同的婚嫁模式还能刺激或抑制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提高或降低那里妇女的生育率。经验显示,招赘婚嫁模式有利于降低妇女的生育水平,在盛行招赘婚姻的农村,妇女的生育率往往下降得比较迅速,而且,降低以后显得稳定、少波动;在时兴嫁娶婚嫁模式的地区,情形正好与此相反。我们对这两种婚嫁模式地区就此所作的相关分析的结果与此也相符合,招赘婚嫁模式与妇女的生育水平之间呈高度负相关(r 在 $-0.8 \sim -0.7$ 之间),妇女的招赘比例越高,其生育水平就越低,而在嫁娶婚嫁模式地区,情形则相反,呈正相关。但是,相关并不能说明婚嫁模式与妇女的生育水平之间必然存在着因果联系。因此,不同婚嫁模式地区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否主要是婚嫁模式作用的结果,即婚嫁模式是否具有抑制或助长人口增长的作用,还需作进一步的实证探讨。为此,我们在嫁娶与招赘两种婚嫁模式并存的湖北省就两种婚嫁模式对妇女生育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

20年来,中国妇女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在世界上受到了普遍称赞。但是,也由此使一些人士对中国的人口政策持有异议,并将之与人权问题相联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经过了前段急速下降之后,或许是由于“极限法则”的作用,进一步下降又正面临着诸多困难,这就使得寻求降低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生育水平的新途径成了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的一项重任。因此设想,如果婚嫁模式能被证实具有降低或增高妇女生育率的作用,那么,通过变革婚嫁模式去降低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就可望成为中国在世纪之交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控制人口的选择之一,我们也将由此找到一条既能进一步降低农村人口出生率,又能

^① 宋瑞芝:《中国妇女文化通览》,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第746~748页。

克服现在计划生育中的重重困难，还能避免许多非议的新途径。

2. 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基本情况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

依据湖北省有 5 个县(市)历来盛行招赘婚嫁模式这一现实，我们在湖北省内挑选出 5 个几乎是清一色地实行嫁娶婚嫁模式的县(市)与之匹配。然后，分别对其进行随机抽样，各取其中 1 个县，再从这两个县的全部村中各随机抽取 1 个村作为研究对象。抽样结果，作为招赘婚嫁模式研究对象的是松滋县永兴场村，作为嫁娶婚嫁模式研究对象的是天门市(县)沈鲁村。

永兴场村素有招赘的习俗，村里许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就是过去逃荒要饭、作手艺来这里入赘的。他们中湖广江浙各省的人都有，可谓来自五湖四海。现在，这个村育龄阶段的招赘妇女有 109 人，占已婚育龄妇女的 19.19%，还有一些女青年正准备招赘和一些男青年正在谋求入赘。村中不少家庭祖孙三辈都是招赘的女婿，人们对招赘这种婚嫁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好。一些有儿子也有女儿的家庭，常常是“嫁子娶婿”，即将女儿留在家里招赘，让女婿来为自己“传宗接代”，伴度晚年，却让儿子外出入赘。人们说这样做是因为女儿比儿子更孝顺父母，翁婿关系比婆媳关系好处。由于长期以来招赘已在永兴场村成为一种风气，所以这里的人对招赘这种婚嫁形式不存在偏见。招进门的女婿绝不会受到歧视，招赘妇女也不会因为招赘而涉嫌嫁不出去而降低自身的价值。相反，村民普遍认为，“好男才有人肯招，好女才有人上门。”这就无形中给招赘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

沈鲁村则不然，全村无一户招赘，也无一人外出入赘。农民认为男子汉给人家当上门女婿是不光彩的，表示他没本事讨不到老婆，因此睥睨入赘者。再加上这里严重的家族观念使得即便是上门女婿也要受到女性家族中伯叔和堂兄弟们的歧视与欺侮，村组、社区中的大小事情都没有发言权，因而造成了村民们对招赘持有与永兴场村村民截然不同的态度。

2.2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永兴场村和沈鲁村虽然分属不同县(市)，且相距 100 多公里，但基本情况十分相似(见表 1)。

表 1 永兴场村与沈鲁村基本情况比较

村别	人均耕地(亩)	劳均耕地(亩)	人均收入(元)	外出务工经商人数(%)	育龄妇女受教育年限(年)
永兴场村	1.5	3.7	1 070	29 1.07	9.3
沈鲁村	1.8	4.2	986	34 1.13	8.1

永兴场村共有 674 户，2 701 人，育龄妇女 588 人；沈鲁村共有 723 户，3 003 人，育龄妇女 625 人。两村自然条件没有多大差异，境内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是江汉平原的宜农地区。棉花

和水稻是两个村的主要作物。村里除了秋冬季随着棉花的收获办有小型轧花厂之外，几乎都没有兴办什么村办企业，* 村民仍以种植业为主；两村均有少数人外出务工经商，人数比例也很接近。虽然两村的条件基本相同，但两村妇女的生育行为却存在着巨大差异(见表 2)。

永兴场村妇女生育率下降得比较快而且比较稳定，已连续 3 年无一例计划外生育，妇女们普遍倾向于少生，3 胎生育早已杜绝；已有一孩夫妇 226 户，占总户数的 39.40%，其中独女户有 98 户，即每 7 户就有 1 户只有 1 个女儿，这在中国农村是罕见的。不仅如此，这个每年只有 30 多个出生指标的村子里，年年都有 15 对以上只有 1 个女儿的夫妇退还下达给她们生育二胎的指标。事实上，少生已经成为全村妇女的自觉行为。目前，这种自觉性还在随

表 2 1994 年永兴场村与沈鲁村妇女生育状况

	出生率 (‰)	自然增长率 (‰)	一孩率 (%)	二孩率 (%)	多孩率 (%)	计划生育率 (%)	独生子女领证率 (%)	退还二胎指标率 (%)
永兴场村	9.93	4.56	91.3	8.7	00.0	100.0	46.80	48.5
沈鲁村	18.06	12.01	33.6	56.8	9.6	64.4	00.0	00.0

注: 退还二胎指标率 = $\frac{\text{退还二胎指标人数}}{\text{计划生育二胎人数}} \times 100\%$

着年龄的降低而升高, 在 20 ~ 29 岁的育龄妇女中, 有 58.81% 的人终身只愿生 1 个孩子, 她们中又有 64.7% 的人终身只愿生 1 个女孩。

沈鲁村妇女仍然保持较高的生育水平, 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始终表现出很大难度, 而且已经下降了的生育率还呈现出很大不稳定性, 1985 ~ 1986 年间出现过明显回升。这里多年来不仅从无一人退还生育指标, 而且每年都有计划外和多胎生育。除了那些因生理障碍 (继发性不孕症) 人家之外, 家家都有 2 个以上的孩子。村民们视那些有能力生育而终身只愿生育 1 个孩子, 特别是只愿生育 1 个女孩的夫妇为 “苕” (傻瓜)。村子里家家都有生男孩的强烈欲望, “不生儿子不罢休” 是沈鲁村村民心理的真实反映。

然而, 两村村民在生育行为与生育观念上的巨大差别果真是由于婚嫁模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吗? 如果是, 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3. 问题的假设, 实证与结果

为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一: 不同婚嫁模式能使妇女产生不同的生育数量需求

实证一: 我们对两个村 20 ~ 29 岁育龄妇女生育数量需求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先问 “在当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形势下, 你想要几个孩子?” 再问: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 你终身愿要几个孩子?” 调查结果表明, 具有不同婚嫁模式的两个村, 不论在有无政策限制的情况下, 妇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需求相差都十分明显 (见表 3)。

表 3 有无政策限制时两村妇女期望生育子女数

愿意生育 子女数	永兴场村 (%)		沈鲁村 (%)	
	有生育政策限制	无生育政策限制	有生育政策限制	无生育政策限制
0	0.01	0.81	0	0
1	50.81	50.81	2.63	2.63
2	48.37	48.37	83.08	73.88
3 以上	0	0	14.28	23.48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从表 3 可以看出, 不论有无生育政策的限制, 永兴场村都有部分妇女的最低生育子女数为零。虽然, 具有这样需求的妇女并不多, 但在一个经济并不发达, 生活也不算富裕的农村, 育龄妇女中居然也像上海、北京等城市一样, 出现了不生育文化, 这不能不使人惊讶赘婚嫁模式对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之大。同时, 她们中最高的期望子女数也只有 2 个, 多胎生育愿望已不复存在。妇女的生育意愿十分稳定, 完全不为有无政策制约而波动, 少生行为

已完全出于他们的自觉。

奉行嫁女娶媳的沈鲁村妇女的期望子女数与永兴场村妇女相差甚远，她们中不仅没有人不要孩子，而且想只生 1 个孩子的人也微乎其微，绝大部分人都期望有两个孩子，还有 14.28% 的人希望生 3 个以上孩子。同时，该村妇女的子女数也随有无政策的限制而发生明显波动、突出地表现在没有政策限制时，2 孩向 3 孩的转化上，使想生 3 孩的人数增加了 9.2 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嫁娶婚嫁模式下，人们潜在着强烈的多胎生育意愿，只是由于政策的约束才未成为现实。

假设二：不同婚嫁模式下妇女具有不同的生育子女数量需求

由于在不同的婚嫁模式影响下，妇女形成了不同的子女性别偏好的结果。可以这样认为，嫁娶婚嫁模式能使妇女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招赘婚嫁模式能使妇女对子女的性别偏好趋于均衡，甚至更喜欢女孩。强烈的男孩偏好造成妇女为得到儿子或多得儿子而多生多育，均衡性别偏好让妇女将生男生女看成一样，因而能做到“生女即止”或者“生男即止”，实行少生。

实证二：首先，我们对沈鲁村 35 岁以下多胎生育的妇女进行了存活子女性别调查，结果发现她们中间有 86.4% 是双女户或多女户，其中又有 34% 的人是在有了 3 个或 3 个以上女儿尚无儿子，为得到儿子而继续生育的。可见强烈的男孩偏好是造成妇女多生多育的主要原因。其次，我们对两个村已有子女的妇女进行了“期望孩子性别调查”，以证实两种婚嫁模式下妇女生育子女性别偏好上的差别。”^①（见表 4）。

表 4 永兴场村、沈鲁村育龄妇女性别偏好比较 (%)

已有子女 性别数量	一 子			一 女			一子一女			二 子			二 女		
	男	女	男女 均可	男	女	男女 均可	男	女	男女 均可	男	女	男女 均可	男	女	男女 均可
永兴场村	2.2	76.7	21.1	38.2	38.7	23.1	28.8	36.7	34.4	32.6	45.2	22.2	51.1	26.2	22.7
沈鲁村	54.3	21.1	24.6	100	0	0	88.9	11.8	5.3	44.6	41.7	13.7	100	0	0

从表 4 看出，沈鲁村已有 1 个或 2 个女孩的育龄妇女，竟无 1 人愿意再生女孩，她们是属于“硬性”地要生男孩的一类，连作“生男生女均可”选择的余地都没有，男性偏好最为强烈。而在永兴场村已经有了 2 个女孩的妇女中，仍有 26.2% 的人愿意再生 1 个女孩，有 22.7% 的人选择生男生女均可。对比分析说明，两村妇女在子女性别偏好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时兴嫁娶婚嫁模式地区的妇女，其男性偏好在整体上都要明显高于招赘婚嫁模式地区的妇女。这在将两个村妇女的性别偏好按已有子女数量和性别相对应所作的曲线图上能直观地看出（见图 1、图 2）。

图 1 和图 2 表明，妇女对预期再生孩子的性别偏好在受已有子女性别与数量影响的同时，更受所在地区盛行的婚嫁模式的影响。尽管两个村妇女的男女性别偏好都随已有子女的性别与数量而波动，并且波动的方向一致，但图 2 显示沈鲁村妇女的整条男性偏好曲线都在相应的点位上高于永兴场村妇女，而图 1 上永兴场村妇女的女性偏好又在整条曲线上高于沈鲁村。这清楚地说明，嫁娶婚嫁模式能增强妇女对子女的男性偏好，抑制她们的女性偏好；招赘婚嫁模式能抑制妇女的男性偏好，提高她们的女性偏好，并最终使性别偏好达到均衡。因此可以认为，沈鲁村妇女追求多生是因为她们在嫁娶婚嫁模式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男性偏好的缘故；而永兴场村妇女的少生、“生女即止”、自动退还二胎指标等行为，则是由于那

^① 调查中，永兴场村很多妇女不愿生育二胎，更不愿生育 3 胎，表中的比例数是我们请她们就“如果让你再生一个孩子，你是想要男孩还是女孩”这一提问作假定性回答而得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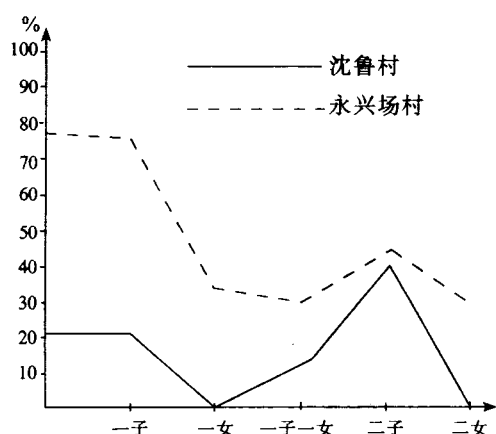


图1 有子女妇女女性性别偏好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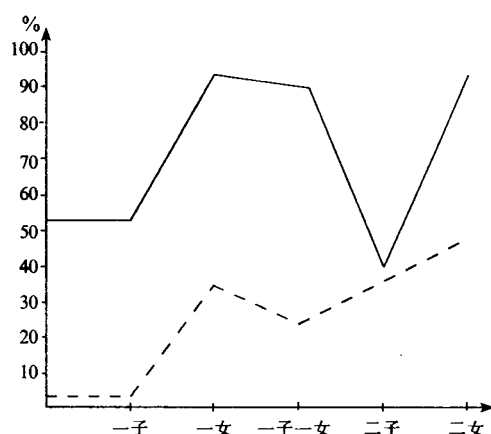


图2 有子女妇女男性性别偏好曲线

里的招赘婚嫁模式提高了她们对孩子的女性偏好，不为追求儿子去一再多生的结果。

假设三：依据“一个人对于能帮助自己达到目的的对象，一般能形成喜欢的态度”这一社会心理学原理，可以认为不同婚嫁模式下妇女对生育子女具有不同的性别偏好，是由于她们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价值有着不同的估计，因而抱有不同的生育目的所致。即如果村民对男孩的预期价值估计高，认为男孩能达到自己生活的某些重要目的，他们就会偏好男孩；反之，如果女孩也能像男孩一样，得到较高的预期价值评估，他们就会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有时甚至女性偏好还会强于男性偏好。

实证三：我们对两个村育龄妇女进行了“孩子预期价值调查”和“生育目的调查”。结果表明，两村妇女无论在孩子预期价值或者是生育目的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见表5、表6）。

表5 育龄妇女对不同性别孩子的预期价值

问题选择	沈 鲁 村				永 兴 场 村			
	男孩价值		女孩价值		男孩价值		女孩价值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感情价值	3	1.12	156	58.64	18	7.13	33	13.41
经济价值	50	18.79	24	9.02	29	11.78	12	4.88
养老价值	81	30.45	15	5.63	89	36.17	94	38.21
传宗接代价值	128	48.12	7	2.63	107	43.49	102	41.46
无价值	0	0.00	33	2.40	0	0.00	0	0.00
没想过	4	1.50	31	11.65	3	1.21	5	2.03
合 计	266	100.00	266	100.00	246	100.00	246	100.00

从表5看出，沈鲁村妇女认为男孩有很高的“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价值，两项比例合计达到78.57%，女孩基本上不能传宗接代和给父母养老，两项价值比例合计只有8.26%，大部分人认为女孩只有一些感情上的价值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而永兴场村妇女却有着相当均衡的男女孩价值观，除在情感与经济价值上男女孩有些差别外，二者的价值基本相近。她们认为男孩和女孩都能赡养老人和传宗接代，男孩的这两项价值合计为79.6%，女孩为79.67%，几乎没有差别。同时，也没有人认为女孩毫无价值。这说明嫁娶婚嫁模式能够压抑和贬低女孩的预期价值，招赘婚嫁模式有助于提高女孩的预期价值。

对子女的不同预期价值又使得两村村民的生育目的大相径庭（见表6）。从表6可以看

表 6 沈鲁村永兴场村村民生育目的

生育目的顺序		1	2	3	4	5	6
沈鲁村	目的	传宗接代	养儿防老	人多势大	寄托希望	增加劳动力	家庭兴趣
	人数	106	93	40	14	10	3
	%	39.84	34.96	15.03	5.26	5.75	1.12
永兴场村	目的	寄托希望	家庭兴趣	增加劳动力	养儿防老	传宗接代	人多势大
	人数	92	51	43	37	13	10
	%	37.39	20.73	17.47	15.04	5.28	4.06

出, 永兴场村妇女想要孩子, 主要是为了寄托人生的希望。但是, 沈鲁村村民却把“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放在生育目的的首位与第二位。这里, 婚嫁模式对人们生育目的制约作用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沈鲁村村民的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历来都很强。近年来, 村中各姓都重新修订了族谱, 过年时大姓还要集资请剧团演“族戏”以壮族威, 增强族内凝聚力; 村里出现大小纠纷, 往往不是靠政府组织和法律来解决, 而是谁家弟兄多, 拳头狠谁家就有理; 大姓欺小姓, 三兄弟户欺两兄弟户, 两兄弟户欺独子户已是司空见惯。显然, 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的农民, 是不可能不以多生儿子、壮大家族、传宗接代为首选目的的。然而, 这种强烈的宗族观念之所以能久聚不散且愈演愈烈, 其物质性的依托又是娶媳嫁女这种婚嫁模式。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以男性为核心的婚嫁模式, 那么宗族观念和这种观念赖以产生的宗族本身就都不可能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历来招赘婚姻比例都很高的永兴场村的现实得到证实。这个村的男性有几十个姓, 男子姓氏之杂为其它农村所少见, 往往一家祖孙三代就有 3 个姓。所以, 这里难以形成宗族, 它和它周围各村向来没有哪个姓建过祠堂、修过族谱, 搞过宗族活动, 青年男子也不固守自己家庭和宗族, 而是愿意到外域他乡去入赘。这使得人们的宗族观念十分淡漠, 使得他们的生育第一目的不是传宗接代, 而是希望孩子有出息以寄托自己生命的希望。

沈鲁村村民将“养儿防老”列为生育目的第二位, 而永兴场村村民只将其放到第四位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传统的婚嫁模式下, 沈鲁村的女儿长大后都要出嫁, 因此这里将一些有女儿无儿的人也称为“孤老”, 在沈鲁村唯有儿子才具有养老功能。这就使得村民们不得不将多生儿子作为重要生育目的以解决老有所养。永兴场村现在虽然也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形式, 但在招赘婚嫁模式下, 女儿不出嫁, 可以终生奉养父母, 并且比儿子还贴心; 生的孩子随娘姓, 能够传宗接代, 使妈妈家里不断香火。招赘婚嫁模式不仅使女儿能够像儿子一样延续宗嗣, 也具有养老功能。这样, “养儿防老”这一在嫁娶婚嫁模式地区具有真理性的结论, 在这里就变成了养儿养女都能防老, 村民因此淡化了养儿的价值观, 当然也大大地降低了对男孩的偏好和全村妇女的生育率。

总之, 调查证实了农村的婚嫁模式能够强烈地影响妇女的生育率。在中国农村最广泛存在的嫁娶婚嫁模式能够增高妇女生育率, 而在少部分地区盛行的招赘婚嫁模式则能通过提高对女孩的预期价值、转变生育目的、降低对男孩的性别偏好等一系列作用, 把生育率持续而稳定地降下来。上述过程可以这样表述: 在招赘婚嫁模式下, 由于女儿不出嫁, 她就能替代男孩的角色, 使父母老年得到感情依托和养老保障; 又由于所生孩子随娘姓, 宗嗣也得以延续。这样, 女孩在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上就丝毫不逊于男孩, 她们的预期价值必然地被提高

到与男孩相同的水平。

4. 关于改革农村婚嫁模式的讨论

永兴场村由于盛行招赘婚嫁模式而使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的事实使我们想到，如果这种目前还只是在少数地区盛行的婚嫁模式能够取代嫁娶婚嫁模式成为农村的主要婚嫁模式，那将会使中国人口控制的难题迎刃而解。因为这种取代意味着，在现有经济、文化教育条件下，经过推行婚嫁模式改革，提倡移风易俗，推广招赘、入赘，使之在广大农村蔚然成风，就可以使农村人口进一步得到控制。不过，这种想法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困难，永兴场村招赘婚嫁模式是几十年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将人口控制的希望寄于婚嫁模式的变革，时间上就有远水无法救近火之虑。

我们以为对于婚嫁模式的转变作具体分析能够克服这一困难。婚嫁模式属于一种社会风俗，改变婚嫁模式是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自然发生，也可有意识地提倡、引导，使其以数倍、数十倍于自然形成的速度发生。因此，只要我们能设计出一套科学的引导方法，在全国农村兴起男到女家的婚嫁之风是可望在 5~6 年或稍长一点的时期里实现的。

系统地提出促成婚嫁模式尽快转变的措施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下列几点是未来设计中不应舍弃的。

4.1 干部、党团员带头作移风易俗的榜样。在转变婚嫁风俗中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激起无数人对其行为的效仿，而且还因为中国农民的保守性与从众性需要有榜样的带动。“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鲁迅）。推行“招赘”这种新的婚嫁模式，如果没有人率先“冒死”迈出第一步，是难以引来无数后继者的；而带头者如果不是深知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的干部与党团员，周围的非议与责难也往往会使其创新行为窒息。但是，一旦这种榜样终于树起，那么，农民群众中强烈的从众性又会使这一新风俗如同“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这类现象一样，藉助模仿、暗示、感染等社会心理途径迅速形成。因此，各级政府、党团组织要鼓励、提倡，必要时甚至是逐个动员符合条件的干部、党团员带头招赘、入赘，在群众身边为他们作出榜样，影响、诱导群众。

4.2 精心组织招赘结婚仪式。在拒绝招赘婚嫁模式的地方，人们对招赘的睥睨态度总是使嫁女娶媳十分热闹，招赘则异常简单冷落。这一热一冷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群众在感情上对招赘陷入低调。因此，地方党政府领导在一段时间要精心组织好那里的招赘结婚仪式，尽量使之办得热烈隆重，声闻于乡里。应当组织一些集体的招赘结婚仪式，党政负责人可以亲自参加并主持结婚典礼，新闻媒体要通过各种形式广为宣传，努力消除人们对招赘的偏见。

4.3 对招赘户给以政策性扶持。这是指为了鼓励男女青年积极入赘、招赘，给响应号召的人家以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帮助他们招赘后迅速致富。这些优惠可以包括在同等条件下，入赘户能够优先进入乡镇企业，优先得到扶贫贷款，优先接受新技术培训，子女可以优先入托、入学、参军等等。

4.4 培养任用入赘女婿。对入赘者中表现突出者，要培养他们入团入党，选拔他们担任基层干部、乡镇企业领导。要表彰他们的成绩，扩大他们的影响，藉以从正面消除群众认为入赘女婿都是没本事之人的偏见。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